

96
K265.07
4
2

民族的苦难 民族的骄傲

——抗日战争史新论

杨树标 梁敬明 主编

杭州大学出版社

C

232648

● 本书承蒙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
研究奖励基金资助出版

目 录

代序——论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杨树标 (1)
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2)
苦难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与不抵抗主义·····	(28)
是还是非: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申诉国联·····	(56)
没有输家:日苏三十年代在中国满蒙的争斗·····	(71)
救亡的变奏:《五五宪草》的制订·····	(87)
对日政策转变的信号: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	(102)
得与失: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几次军事会议·····	(131)
正面战场的一个战例:蒋介石与台儿庄战役·····	(151)
求援之行:1942年宋美龄出访美国·····	(171)
谁决定了日本的失败:中国八年抗战·美国 原子弹·苏联出兵·····	(206)
铁肩重担: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218)
在另一条战线:毛泽东与抗战时期中共党的建设·····	(229)
废与兴:战时金融与大后方经济的开发·····	(243)
东西之间: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265)
烽火一隅:浙江的抗战·····	(281)
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领域·····	(290)

代 序

——论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杨树标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 50 周年了。这场在 50 年前进行的、长达八年的、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极其复杂和极端艰苦的环境与条件下进行的。在这八年抗战中，记下了我们民族的苦难，也记下了我们民族的悲壮。中华儿女在这次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八年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

一、这场战争是怎么进行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军事战争，但又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容，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以军事为主体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总体战。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进行的决死战争。

大家知道，“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实行中国全民族人民战争，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战的方针。

在八年抗战中，有正面作战的战场和敌后作战的战场。正面作战的战场“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敌后作战的战场则由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承担。这两个战场是互相配合而又相对的独立。

在正面战场上，“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当时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分头发给了抵抗日军入侵的密电。10日，蒋介石又两次往山东乐陵（当时宋哲元住在山东乐陵老家）发电报给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11日，宋哲元由乐陵到了天津，接着，蒋介石先后十一次致电宋哲元进行抵抗。于是，国民党军队进入第一期抗战。

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失守，在北战场有四路战斗。第一路是平津战斗、保定战斗和石家庄战斗；第二路是南口战斗、张家口战斗和平型关战斗；第三路是姚官屯战斗和德州战斗；第四路是忻口会战。忻口会战是当时北战场上规模最大、作战时间较长、敌我伤亡均重的一次极其激烈的战役。会战是10月2、3日打响的，一直打到18日，何应钦在《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说：“歼敌三四万人，造成华北各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郝军长梦龄、刘师长家麒，均于是役殉国，我朱德部在敌后方袭击，迭次与敌重创。”在东战场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淞沪一带是国民党政府首都的门户，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标志。战前，国民党对淞沪一带已作了局部性的防御措施，不像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那样，下关日舰一声炮响，国民党只得迁都洛阳。当时在京沪杭地区，自江阴至无锡一线和苏州至常熟至福山一线以及乍浦至嘉兴一线，都构成钢筋水泥的工事。同时，有三个教导师分别驻在常熟、江阴、无锡、苏州一带。在上海，根据张治中的建议，抽调陆军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队进驻市区。1937年7月13日，蒋介石密令：“（1）京沪区着令张治中迅即前往负全责。（2）虬江码头不必破坏。（3）沪市保安总团及警察总队准由军政部补充弹药。（4）前预定开

沪之钟松旅一团应以速开至近便地点。”7月14日，俞鸿烈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了上海设防情况。“八一三”淞沪会战一打响，双方都在增兵。日军增至10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不下30万人，大炮300多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兵舰数十艘。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兵力达50多个师、70万人。在交战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伤则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列”。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往往日军白天攻占，晚上又为国民党军队夺回来。双方伤亡重大。会战一直打到11月初。11月8日。第三战区总部颁布了转移命令。9日早晨，淞沪前线部队分两路撤退，一路向南京方面撤，一路向杭州方面撤。“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南京保卫战虽然规模不大，交战的时间也不长，最后还是丢失，但决定保卫南京是对的，因南京是首都，又是孙中山的陵墓所在，是“国际观瞻”所系，无论当时主张象征性的防守或是主张死守，都是无可指责的。仗打得十分激烈，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撤退时虽有宋希廉的三十六师压阵，但撤退的大队人马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抢先渡江，秩序混乱达于极点。“撤退时毫无计划（计划当然是有的，12日的撤退会议只有二十分钟，长官部参谋长周嫫以印好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问题是各部均不遵令突围），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

从南京失守到徐州失守，在北战场有津浦路南北两段的战斗、台儿庄战斗和平汉沿线、晋南的战斗。京沪战事一结束，津浦线就成为日军攻击的次一目标。“我如果在津浦线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以继续，与敌人作

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当时,津浦路北段的战斗是韩复榘指挥的,打得比较糟糕,蒋介石不指名的痛骂说:“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劣心理,不顾国家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只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最后将韩复榘逮捕处决,“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振奋了士气和民心”。津浦路南段的战斗打得还不错,在淮河北岸,血战逾日,双方打成平手,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淮河南段,激战甚烈,形成对峙状态。在津浦路南北两段战斗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台儿庄战斗为中心的徐州会战。日军在津浦路南段遭到国民党军队阻截后,就在北段鲁南方面,以第五师团板垣部和第十师团矶谷部,附有力之骑、炮兵及机械化兵,分由兖州、临沂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策应津浦路南段日军攻势,最后会攻徐州。结果在临沂遭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庞炳勳(后来投降日军)的军团的内外夹击,切断了日军两个师团会师,造成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在台儿庄遭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队阻击,战斗极为激烈,死伤日军11000余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这一战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在东战场有杭州及杭富附近的战斗和芜湖湾沚附近的战斗。

从徐州失守到武汉失守,在长江方面有武汉会战。在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武汉就成为战时的军事和政治中心。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了攻占汉口作战和为切断补给线路的攻占广东作战”。面对日军的进犯战略意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策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规定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妨碍长江下游的航运,牵制和消耗敌人;另外支援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敌人,阻止他们溯江攻九江;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作持久战,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

的自由。预期可与日军的主力作战4至6个月。消耗敌人，粉碎他们的继续攻势。当时，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余架，分四路进犯武汉，沿途遭国民党军队节节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最终，广州和武汉先后被日军占领。

武汉失守以后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军队进入第二期抗战。国民党在湖南衡阳北面的南岭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军事委员会策定了所谓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同时，将全国战区重新作了划分。在国民党的战史上列举了第二期抗战中有几十个战斗，比较大的战役如随枣会战、粤北会战、豫鄂会战（张自忠就在此役中为国献躯）、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通讯报》也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和缅北会战（是中国远征军打的，打了近9个月，把战线推进600英里，中印公路得以畅通）。

在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在战争史上出现了奇观。

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根据彭德怀在1944年8月对美军观察组的谈话，“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平型关战斗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四）抗战五周年至今”。

在第一个时期，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在太原失守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是配合国民党军队行动。在平型关，我军化

了重大代价。在运动战中击溃了日军板垣师团，创开战以来的胜利记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在太原失守后，我军在华北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我军有计划地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四座大山（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日军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牵制日军的调动；另一方面主动地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伪军。

在第二个时期，华北的局面一天比一天艰难，我军针对日军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在“反扫荡战”中，在晋察冀、在冀中、在冀察热、在晋冀豫、在冀鲁豫、在山东、在晋绥和陕甘宁，我军打了不少漂亮的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三次、四次、五次的大“扫荡”和六路、九路乃至十二路的围攻。在晋察冀的来源战斗中，打死日军中将阿部，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日军中将级军官的第一次。在“交通破击战”中，在山区，我军主动地发动了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破坏日军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军整年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平均每天破坏铁路6里，公路30里，桥梁一座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毁日军一个火车站，每九天炸毁日军一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日军一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3853斤。尤其是百团大战，“这是一个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系在统一的计划下各地区同时发动的。时间整三月又半，使用兵力达103个团，战线之阔，包括有晋、冀、鲁、豫、察各省。先后受我打击的敌军有一一〇师团、二十五师团之全部。第二十六、三十六、四十一师团之各两个联队，第三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之各一联队，第一、二、三、四、五、七、九混成旅团之全部，第六、十五混成旅团之各一部，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胶济、白晋、石德等八大铁路均被我破坏得支离破碎”。百团大战充分

显示了中华民族潜在力量的无限伟大,并证明毫无接济的八路军是中国抗战的主力,整个中国战场,抗战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

在第三个时期,由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国民党的观战、“曲线救国”以及华北地区连年自然灾害,使我抗战出现严重困难局面。我采取了一个新的斗争方针。即“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退’,‘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1941年11月,我军粉碎了日军6万人对晋察冀北岳区的“扫荡”。1942年4月,粉碎了日军5万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同年5月,又粉碎了日伪8万人对太行山实行“铁壁合围”。

在第四个时期,我军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持打击日军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地主动出击,扩大华北解放区。

新四军在华中的抗战,根据《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军先后经历了四个战略时期。从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正式组成起,至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止,是发展时期”。“从一九四一年一月起,至一九四三年冬止,是坚持时期。”“从一九四四年春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止,是恢复再发展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起,至一九四六年一月止,是战略反攻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我军挺进敌后,领导人民反对暴敌。经过艰苦斗争,完成了在大江南北实施战略展开、初步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的任务，并使部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为尔后发展苏北打下了基础。

在第二个时期，我军在皖南事变后，立即独立自主地重建了军部，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以积极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磨擦斗争，粉碎了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无数次进攻，坚持了华中抗战阵地，开辟了浙东游击根据地。

在第三个时期，我军利用有利形势，对日伪军进行了一系列胜利的军政攻势；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进行了自卫反击，恢复了豫皖苏边区的抗战阵地，打开了苏浙皖地区的抗战局面。

在第四时期，我军一面独立自主地进行了战略反攻，向华中解放区周围及孤立于解放区的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猛烈攻势，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基本上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广大地区内的残余日伪军；并和山东解放区军民密切协同作战，使山东和华中两大战略区连接了起来。另一方面，又抽调了一部分主力向东北进军；组织了苏浙边、皖南、皖中部队北撤、东移和一部分主力北上山东；整编了军队；准备了迎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场。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如日本一位史学家所说：“国民党区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各自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是事实，但在两者之间，除对立的一面之外，还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就是说，一方的存在形态规定着另一方的存在形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作出了功绩，那些为争取国家民族生存而阵亡的国民党官兵是民族英雄，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而敌后解放区战场最初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后来逐渐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这场战争打赢的原因和所化的代价

八年抗战最后是中国人民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场战争胜

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化的代价是巨大的。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高举抗日的大旗。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党就致力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尤其是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和共产党停战并合作抗日。抗战爆发后，针对抗战初期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我党明确提出了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针对台儿庄胜利后出现的“速胜论”和徐州失守后出现的“亡国论”，我党向全国人民阐明了持久战的思想。当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且规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在党内有人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四一二政变”和“马日事变”的重演时，我党又马上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孤立顽固势力”，同时又制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正是由于我们党高度灵活地处理了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倾向性绝然相反的，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发展，拉住蒋介石，使他不得不勉强维持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直到取得抗战胜利。我们党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是广大国民党官兵、政府官员“坚持抗日”。

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不少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无论在武汉失守前还是在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是打了不少仗，取得了不少胜利的。伤亡官兵达331.14万多人。

第三，是国际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政府不仅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支持，而且给予巨大的物资援助，从1937年至1940年向中国

提供了4.5亿美元的贷款,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苏联计供给中国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多挺机枪和其他军用物资,还派出3665名军事专家来华培训中国军官,1940年秋天,苏联的崔柯夫将军出使中国,担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苏联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了保卫武汉等地的战斗,使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气焰一落千丈。原来日军轰炸机基地都设在离前线50公里内,但当苏联志愿航空队出现后,日本空军不得不把基地转移到500或600公里的后方去。1938年2月28日,在武汉空战中他们大败日本空军。同年4月23日,在汉阳、黄冈上空,他们同36架日机激战,击落日机21架,其余全部逃窜。另外,美国在太平洋反攻的胜利,不仅使在华日军主力调往太平洋,而且致命地打击了日军。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美军在瓜达康纳尔岛反攻并获胜之后,日军开始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美国凭借强大的海空优势,与英、澳、荷等国军一起,采取越岛进攻,击败太平洋上的日军,1944年7月,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打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1945年2月,美军重返菲律宾。6月攻占冲绳岛,打破了日本的大门。日本已经完全丧失制空权,海军已被摧毁,海上交通线被完全切断,本土遭到美军飞机和舰队的不断袭击。在此期间,日本只得陆续从中国战场上(包括中国东北)抽调三四十个师团以对付太平洋上的美军,原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精锐师团均已调离。这无疑的是对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间接援助。

第四,是中国人民化了巨大的代价。

在八年抗战中,损失了公私财产,仅就可以掌握的数字而言——诸如被掠夺的银行金银和被破坏的产业、交通、设备等,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即达313.30136亿美元之巨。另外,非战斗员伤亡达842万人以上。

总而言之,抗战的胜利是全民族拚死斗争所取得的。

三、这场战争打赢的意义

首先，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反帝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中国人民在战争全局上打败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扭转了100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

第二，这场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这是法西斯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开端。在抗战中，1942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有4国（美、中、英、苏）领衔的26国签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942年1月，蒋介石因罗斯福的提议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所以这场战争打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大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

第三，这场战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页。

抗日战争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我党和我军力量得以发展壮大。长征到达陕北时只有3万军队，而经过八年抗战，一跃为120多万党员、100多万军队、200多万民兵，这就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同时，在抗战中，我们党在解放区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治理的经验，如整风、三三制、“延安精神”等等，这些都为革命胜利后建党治国提供了楷模。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国全民族的八年英勇斗争战绩，将永垂史册。

中流砥柱：抗日战争时期的 中国共产党

梁敬明

抗日战争的历史，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失败后，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它洗雪了中华民族负受的百年耻辱，预示着长期困顿后的觉醒和崛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处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倡导并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高举抗日的大旗，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战略策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抗日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同样地，抗日战争的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正如胡乔木同志在《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的信》中所指出的：“抗战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而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① 本文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三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认识。

① 《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第1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它的建立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本前提的。相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中，国民党明显地处于被动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动地提出、推动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首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代替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各阶层的爱国人民纷纷起来，要求反抗日本侵略，并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大片土地上，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奋起抵抗，他们在白山黑水间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却一再退让，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迅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就发出了抗日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主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9月22日，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打击。同时针对蒋介石的妥协和不抵抗政策，提出在抗日的同时也要反蒋。25日，赣西南、闽粤赣、湘鄂西、鄂豫皖、湘东南、鄂豫、湘鄂赣等地区的苏维埃政府驻沪代表，联合发表了《全国各苏维埃

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除了上述宣言和决议外，中国共产党还派遣自己的军政干部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赴满洲地区协同当地的党组织创建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抗日斗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又接连发表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压迫民族通电》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同时，还发动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援十九路军的抵抗活动，并且不顾苏区财政的严重困难，汇款数万元支援上海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变化了的国内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极为严重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更好地向前推进。显然，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把各阶层的群众组织到抗日反蒋战线上来，发展革命力量，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的迫切任务。但是，由于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太好形势。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关内。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内形势更加恶化。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